

# 民国时期故宫博物院出版事业的变迁

The Evolution of Republican-era Publishing at the Palace Museum

张小李

*Zhang Xiaoli*

故宫博物院  
The Palace Museum

Journal of Gugong Studies 2015Vol.15

故宫学刊

二〇一五年 总第十五辑

故宫出版社 | The Forbidden City Publishing House

# 民国时期故宫博物院出版事业的变迁

## The Evolution of Republican-era Publishing at the Palace Museum

张小李

Zhang Xiao li

### 内容提要:

故宫博物院在民国时期的历史，从北京（北平）的治理权更替及故宫博物院事业的发展脉络角度，可分为北洋政府时期、国民政府前期、古物南迁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后期等五个阶段。各个历史分期的出版事业，与故宫博物院的整体工作一样，呈现阶段性特征：在北洋政府时期蹒跚起步，国民政府前期迅速达到顶峰，古物南迁时期勉强维持，而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后期则急剧衰落。民国故宫博物院出版事业与文物（文献）的整理、展陈、研究等相互促进，出版物品类丰富，发行范围广，社会影响大，在民国出版史和文化史上占据重要地位。

### 关键词:

民国 故宫博物院 出版

### ABSTRACT:

The Republican-era history of the Palace Museum, from the angle of the alternating control of Beijing (or Beiping) and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Palace Museum, may be divided into 5 historical periods: the Beiyang Government period, the early years of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the years which saw the forced evacuation to the south of the museum collections, the years of the Resistance War against Japan, and the late years of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Like the overall work on the Palace Museum, its publishing cause in these historical periods took on 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started haltingly in the Beiyang Government period; rose rapidly to the peak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struggled to exist in the years which saw the forced evacuation of the museum collections; and plummeted during the years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nd the late years of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The Republican-era publishing cause of the Palace Museum, which progressed, though slowly, alongside the sorting, display and research effort for cultural heritage (and literature), led to varieties of publications of widespread distribution and social influence, possessing an important place in the publishing and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Republican era.

### KEYWORDS:

Republican era, the Palace Museum, publishing

中国出版业在晚清经历了近代化转型，新式印刷技术广泛使用，进入民国后，五四新思潮促进了出版业的进一步发展。作为现代出版业的组成部分，博物馆出版事业起步于民国初期。民国十四年（1925）十月在紫禁城后宫成立的故宫博物院，虽然比民国三年（1914）在紫禁城前朝组建的古物陈列所要晚11年，但其出版业后来居上，印行了一大批期刊、书翰、名画、史籍、目录、书影、诗文集等刊物，成为当时博物馆界出版业之翘楚。

民国故宫出版事业与故宫的发展历程呈现基本相同的轨迹：故宫事业稳定发展时，出版事业就兴旺，而当故宫遇到坎坷，出版事业也随之遇挫。因此，研究民国故宫出版事业的发展、变化，需将其置于具体的历史背景中，考察其阶段性变化。

## 一 民国故宫博物院的历史分期

故宫博物院的所在地北京，民国期间统治权数度转移。民国元年（1912）清王朝覆灭至十七年（1928）五月北伐战争胜利，北洋政府一直控制着北京。十七年六月到二十六年（1937）全面抗战爆发，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北平。抗战期间，北平沦陷。抗战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又恢复了对北平的治理。因此，故宫博物院在民国期间的历史，依统治权的变化，可以分为北洋政府时期、国民政府前期、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后期等四个阶段。

民国时期故宫博物院的历史，除受时代大背景影响外，其自身还有特殊的历史节点。根据这些历史节点，结合北京统治权行使主体的变化，可以对故宫博物院在民国期间的历史进行划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最具有参考价值的是那志良先生结合自身经历对故宫历史进行阶段论述的系列论著<sup>1</sup>。

1957年，那志良先生在《故宫博物院三十年之经过》<sup>2</sup>一书中，将民国十三年（1924）至三十八年（1949）的故宫历史分为溥仪出宫、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时期、故宫博物院成立初期、故宫博物院鼎盛时期、文物南迁时期、南京分院成立时期、抗战文物疏散时期、文物复员时期等八个阶段。

在1966年出版的《故宫四十年中》<sup>3</sup>，那志良先生将故宫历程仍然分为八个阶段，但又有调整，分别为：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时期、故宫博物院成立、走向艰难之路、故宫博物院鼎盛时期、文物南迁时期、南京分院成立时期、文物疏散时期、文物复原时期。

到20世纪90年代，那志良再撰写《典守国宝七十年》<sup>4</sup>〔图1〕，将民国故宫历史分为故宫博物院成立初期、故宫博物院鼎盛时期、文物南迁时期、疏散后方时期、胜利还都等五个阶段。此外，该书第一部分叙述那先

1 20世纪70年代，那志良先生用分段记述的方式，在台湾《传记文学》杂志第三十六卷第四期起至第三十八卷第六期至发表连载文章，述其1925年到1974年在故宫五十年的经历，后集结出版为《我与故宫五十年》，在该书中，那先生发表内容为：故宫博物院的成立，故宫博物院的鼎盛时期，北伐成功后故宫博物院的忧喜，好景不常、文物南迁，故宫文物分批南迁，沪上寓公、伦敦艺展，故宫文物运到南京，故宫文物疏散后方（一），故宫文物疏散后方（二），故宫文物的复员，复员后的故宫博物院，共11部分。（那志良：《我与故宫五十年》，黄山书社，2008年1月）因连载文章受每一期篇幅的局限，内容易割裂，因为，本文在梳理那先生故宫历史分期的思考历程时，只将《我与故宫五十年》作为参考。

2 那志良：《故宫博物院三十年之经过》，台湾“中华”丛书委员会，1957年1月。

3 那志良：《故宫四十年中》，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年。

4 那志良：《典守国宝七十年》，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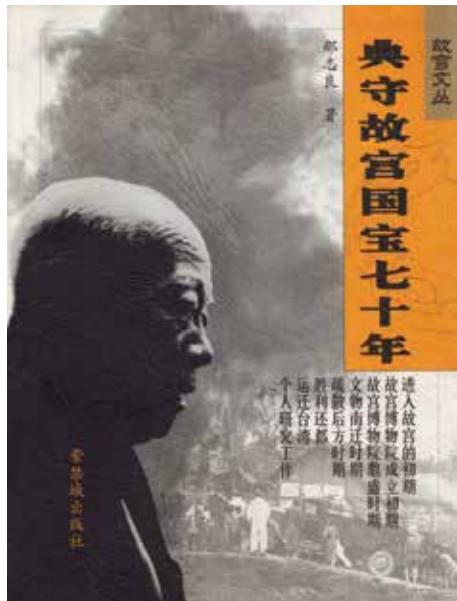


图1 《典守国宝七十年》封面

生“进入故宫的初期”，包含了清室善后委员会时期。

那志良先生这一系列专著的时间跨度达40年，可以看到他对民国故宫历史分期的思考逐渐成熟的过程：其一，事件不再纳入分期范畴。《故宫博物院三十年之经过》将“溥仪出宫”单独作为一个阶段，溥仪出宫是一个事件，是故宫博物院建立的前提条件，所以从《故宫四十年中》开始，溥仪出宫不作为一个阶段出现；其二，时间点重合的分期归并在一起，《故宫博物院三十年之经过》、《故宫四十年中》两书中将文物南迁时期、南京分院成立时期分为两个阶段，因南京分院成立属文物南迁时期，《典守国宝七十年》将其合并在一起；第三，个别阶段划分存在分分合合的情况。《故宫四十年中》将《故宫博物院三十年之经过》所划分的“故宫博物院成立初期”这一阶段划分为“故宫博物院成立”、“走向艰难之路”两个阶段，而在《典守国宝七十年》又恢复为“故宫博物院成立初期”。

总体看来，那先生在《典守国宝七十年》对故宫民国历史的分期是最合理的，其与北京的控制权更替的关系最为接近，如下表所示：

北京控制权的变化	《典守国宝七十年》所述的故宫的历程
北洋政府时期	故宫博物院成立初期
国民政府时期	故宫博物院鼎盛时期、文物南迁时期
抗日战争时期	疏散后方时期
国民政府时期	胜利还都（文物复员时期）

需要注意的是，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国民政府虽然继续对华北行使治权，但社会心理进入恐慌状态，古物南迁提上议事日程。从故宫古物拟议南迁开始，全院工作格局的平衡被打破，工作重心发生转移。古物南迁开始后，故宫的精华文物踏上漫漫旅程，而全院职员也随文物分散。所以，那先生将抗战前国民政府统治这一阶段故宫的历史分为故宫博物院鼎盛时期、文物南迁时期，这是非常合理的。

上述那志良先生对故宫的历史分期的时间节点，基本上也是故宫历史上的关键时间点：溥仪出宫（民国十三年（1924）十一月五日）、清室善后委员会成立（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故宫博物院成立（十四年（1925）十月十日）、北伐战争胜利（十七年（1928）五月）、古物南迁（二十二年（1933）二月至五月）、抗战爆发，南迁文物疏散（二十六年（1937）七月）、抗战胜利（三十四年（1945）八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年10月）。

以民国故宫所在地北京的控制权更替为纲，结合那志良先生对故宫历史的划分以及关键的时间节点，本文将民国故宫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序号	阶段	时间段
第一阶段	北京北洋政府时期	民国十三年（1924）十二月至十七年（1928）五月
第二阶段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	民国十七年（1928）六月至二十二年（1933）一月
第三阶段	古物南迁时期	民国二十二年（1933）二月至二十六年（1937）六月
第四阶段	抗战时期	民国二十六年（1937）七月至三十四年（1945）八月
第五阶段	南京国民政府后期	民国三十四年（1945）九月至1949年10月

北京北洋政府时期含清室善后委员会时期和故宫博物院成立初期；南京国民政府治初期为故宫博物院的鼎盛时期；古物南迁时期北平的治权仍为南京国民政府，但此时故宫的事业已从巅峰期衰落；抗战时期，北平的治权为日伪所掌握，而故宫疏散到后方的文物及办事处的治权仍为国民政府，所以，这一阶段以“抗战时期”称之；南京国民政府后期，指代文物复员时期或者解放战争时期。

民国故宫的出版事业，是故宫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与故宫的历史分期基本上是吻合的，在民国的24年历史中（民国十四年（1925）至三十八年（1949）），北伐战争胜利后、古物南迁前的国民政府治理初期（民国十七年（1928）六月至二十二年（1933）一月）的4年多时间才是故宫安定发展时期。而之前的北洋政府时期，故宫受到守旧势力的种种阻挠；古物南迁之后，精华文物装箱南运，颠沛流离，其中的部分文物回到故宫，已是解放之后的事情了。

民国故宫的出版事业，与国家命运、故宫时运呈现出相同的轨迹：北洋政府时期，在艰苦的环境中肇始；国民政府治理初期，达到顶峰；从古物南迁开始，便呈下降轨迹。

## 二 民国故宫博物院出版的起步：北京北洋政府时期

民国十三年（1924）四季度北京风起云涌。十月二十三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十一月五日，逊帝溥仪出宫，十二月二十日，清室善后委员会成立，开创了故宫博物院在北洋政府治理下的历史。十七年（1928）六月，北伐战争胜利，北平由南京国民政府管辖，故宫博物院（含清室善后委员会时期）在北洋政府治下的历史有3年半。这一时期故宫管理机构变动最为频繁，各项工作在艰难曲折中向前发展，出版事业也蹒跚起步。

### （一）相关出版责任机构钩沉

北洋政府时期，故宫的管理机构历经清室善后委员会（民国十三年（1924）十二月二十日至十四年（1925）十月十日）、故宫博物院临时董事会、临时理事会（民国十四年（1925）十月十日至十五年（1926）四月五日）、维持员（民国十五年（1926）四月五日至七月二十一日）、保管委员会（民国十五年（1926）七月二十一日至八月六日）、维持会（民国十五年（1926）十月十三日至十六年（1927）十月二十一日）、管理委员会（民国十六年（1927）十月二十一日至十七年（1928）六月十八日）等六次变迁。

这一时期是故宫博物院的草创时期，清室善后委员会及后续管理机构类似于民间社团，其下属机构设置、

功能划分、职责界定处于逐步发展、完善之中。由于相关档案、资料匮乏，现有研究论著在研究清室善后委员会等故宫管理机构时，均采用了粗线条的论述方式，对其内部运作机制研究不足。现根据现有出版实物、零星档案，对该阶段故宫博物院与出版有关的机构和职责进行粗略的钩沉。

清室善后委员会成立时，只有 15 位委员、3 位监察员和若干助理员<sup>1</sup>，据《清室善后委员会组织条例》第四条：“委员会以六个月为期，如必要时得酌量延长之。其长期事业，如图书馆、博物馆、工厂等，当于清理期内，另组各项筹备机关，于委员会取消后，仍继续进行。”<sup>2</sup>这反映出，清室善后委员会刚成立时，本身没有详细的机构划分，各项机构在工作中逐步建立，后转变为故宫博物院的院内机构。正因为如此，在清室善后委员会时期出版的著作《故宫物品点查报告》、《故宫摄影集》等，以清室善后委员会作为出版责任机构，我们无法细分其究竟是由清室善后委员会哪一个下属机构具体负责的。但有一组命名为《故宫影片》<sup>3</sup>的明信片，出版者为清室善后委员会摄影股，由此可见，清室善后委员会内部逐渐有详细的机构职责划分，而其中负责摄影的摄影股，至少承担了明信片出版职责。

民国十四年（1925）十月十日故宫博物院成立后，设临时董事会和临时理事会，在临时理事会下设置负责馆务的古物馆、图书馆，负责总务的总务处，机构设置逐渐明细。古物馆、图书馆、总务处分别承担了出版职责。

这一时期，古物馆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出版，其文物流传职责是传拓古物。古物馆设立了流传课，制定了传拓各种古代铜器细则及钤拓古印规则等。凡审查考定过的各种彝器的文字器形，只要有流传价值，均传拓售卖。

民国十五年（1926）十二月九日，故宫博物院维持会成立，来年一月六日公布《故宫博物院维持会暂行组织大纲》，业务仍分古物馆与图书馆；事务分总务股、保管股、建设股、警卫股及招待股<sup>4</sup>。三月二十一日，公布《古物馆流传课流传经费收支暂行办法》，规定“本馆流传课拓印各种流传品分别出售，即以所收售价充作拓印各物工料之用，如有余利，则储作扩充流传事业基金”<sup>5</sup>，将古物馆拓片获利作为流传事业（出版事业）基金，有利于其可持续发展。

本院官办发行机构出版物发售室成立。民国十六年（1927）八月三十日，维持会公布《出版物发售室简章》，规定：“本院暂设出版物发售室，经理各项出版物之发售事宜，隶属于总务股。”<sup>6</sup>

在维持会之后的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时期，本院的出版事业发展迅速。至少有三个机构与刊物印行有关：总务处工程课印行了《故宫摄影集》、“故宫建筑明信片”。民国十七年（1928）的《本院总务处工程课支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补助费报告书》记载了工程课为出版《故宫摄影集》、“故宫建筑明信片”而支付给茂林玉商行的购入照相材料费用、和济印刷局制造铜版及印刷费用。《故宫摄影集》计划就开放的三路

1 吴瀛：《故宫尘梦录》，第 23 页，紫禁城出版社，2005 年。

2 吴瀛：《故宫尘梦录》，第 19 页，紫禁城出版社，2005 年。

3 陈万里摄：《故宫影片》，清室善后委员会摄影股印行，约民国十三年（1924）。

4 吴瀛：《故宫尘梦录》，第 120 页，紫禁城出版社，2005 年。

5 《古物馆流传科流传经费收支暂行办法》，故宫博物院档案室藏：《故宫博物院·领导指导类》第 8 卷，第 1 页，民国十六年（1927）三月二十一日。

6 《出版物发售室简章》，故宫博物院档案室藏：《故宫博物院·领导指导类》第 7 卷，第 1～2 页，民国十六年（1927）八月三十日。

分三集摄制，每集分上下二册，各印 400 份，总计 2400 本，约需制版及印刷费 600 余元。“故宫建筑明信片”共花 495 元 3 角 5 分<sup>1</sup>。文献馆的前身图书馆掌故部编纂的月刊《掌故丛编》问世。创设照相室，“十七年春，创设照相室，预备影印流传书画刊物”<sup>2</sup>。

综上，在北洋政府时期的三年多时间里，本院事业尚处于起步阶段，机构划分与职责都不太明晰，且由于档案资料缺乏，给我们了解当时出版相关机构的历史造成了难度，但我们仍可以在当时刊物的机构责任者清室善后委员会、故宫博物院之外，发现下属部门清室善后委员会摄影股、古物馆流传课、总务股出版物发售室、总务处工程课、图书馆掌故部等，承担了刊物出版职责。

## （二）出版成就

北洋政府时期，故宫的出版物主要有点查类出版物、传拓类出版物和史料类出版物等。

### 1. 点查类出版物

清室善后委员会存在了约 10 个月时间，主要工作是点查宫中物品，编写清点报告，并逐期刊布。由清室善后委员会编辑的《故宫物品点查报告》（故宫丛刊之一）<sup>3</sup> [图 2]，共 6 编 28 册，各编以各宫、殿、堂、园等



图 2 《故宫物品点查报告》 余宁川拍摄



图 3 《甲子清室密謀復辟文證》封面

为单位分册，较大殿堂一处一册，较小殿堂多处合为一册，记录了点查物品名称、件数、年代、残缺、包装等项，并冠以编号。该书的出版时间跨度约 10 年。配合《故宫物品点查报告》，清室善后委员会编纂出版了《故宫摄影集》（故宫丛刊之三）数册<sup>4</sup>。

在点查的过程中，清室善后委员会发现了逊帝溥仪试图复辟的证据。民国十四年（1925）七月三十一日点查养心殿时，发现十三年（1924）春夏间清室密谋复辟文件，于九月一日刊行了《甲子清室密谋复辟文证》（故宫丛刊之二）<sup>5</sup> [图 3]，公布了内务府大臣金梁条陈二事三事四事及列举贤才各折，康有为请庄士敦代奏游说经过函等涉嫌复辟帝制的文件，并在该书附录中公布了清室善后委员会向京师地方检察厅、京师高等检察厅报案函件，致外交部驱除英国人庄士敦函件。因高等检察厅“查金梁等阴谋内乱事在本年一月一日赦令以前”

1 《本院总务处工程课支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补助费报告书》，故宫博物院档案室藏：《故宫博物院·财务类》第 195 卷，第 48～50 页，民国十七年（1928）。

2 《故宫博物院古物馆概览》，第 2 页，故宫博物院编印，民国二十一年（1932）十月。

3 《故宫物品点查报告》，清室善后委员会刊行，民国十四年（1925）三月至二十三年（1934）八月。

4 《故宫摄影集》与《故宫物品点查报告》一样，清室善后委员会时期以及故宫博物院成立后均有出版，但印行情况（册数，每册内容，出版时间）还需进一步研究。

5 《甲子清室密谋复辟文证》（故宫丛刊之二），清室善后委员会刊行，民国十四年（1925）九月一日。



图4 《金薤留珍》封面



图5 《掌故丛编》封面

为由，未将此事立案。

清室善后委员在点查的过程中，还发现了逊清皇室随意出借字画玩物的“诸位大人借去书籍字画玩物等糙账”，以及以赏赐为名而将《天禄琳琅》、《石渠宝笈》三编所载宋元明版书籍 200 余种、唐宋元明清五朝字画 1000 余件等携带出宫的“赏溥杰单”一束、“收到单”一束，将其集结为《故宫已佚书画目录三种》<sup>1</sup>（故宫丛刊之四）出版。此外，还将发现的抵押变售故宫古物的“清室内务府与北京盐业银行借款合同三件”、“清内务府招商标卖玉器、瓷器、古铜估价单”集结为《故宫已佚古物目

录二种》<sup>2</sup>（故宫丛刊之五）刊行。

## 2. 传拓类出版物

这一时期，古物馆开始钤拓最负盛名的《金薤留珍》印谱〔图 4〕，清乾隆朝将所搜古铜印贮为“东”、“璧”、“图”、“书”、“府”五篋，含官私印共 1291 方，由王昶、唐源邨（唐醉石）、马衡、吴瀛钤拓，周白吾、齐念衡、庄严、马权襄助<sup>3</sup>，那志良、吴玉璋担任编目工作<sup>4</sup>。

保管委员会时期，故宫实际上处于无人负责的状态，但故宫的各项业务方面却仍在进行。《金薤留珍》印谱历时 3 个多月后，于 8 月钤印完成，每部 24 册，共钤 24 部<sup>5</sup>。该印谱价格昂贵，钤印困难，为了使其广泛流传，故宫后来将该书影印出版<sup>6</sup>。

民国十六年（1927）维持会时期，古物馆还传拓了《毓庆宫藏汉铜印》，这一批铜印藏于毓庆宫，共 100 纽，无谱录，无序目，“盖将继续收集以续前谱（《金薤留真》），如《西清续鉴》、《宁寿鉴古》之例而未成者也”<sup>7</sup>。

此外，古物馆还拓印了大量的青铜器、铜镜等类别的拓片。

## 3. 史料类出版物

民国十七年（1928）一月文献馆的前身图书馆掌故部编纂的史料类月刊《掌故丛编》〔图 5〕问世，掌故部本打算将所藏宫内档案、军机处内务府档案“辑为长编，以存一朝文献”，但这项工作过于庞大，于是以

1 《故宫已佚书画目录三种》（故宫丛刊之四），清室善后委员会刊行，民国十五年（1926）六月二日。该书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改编为《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四种》印行，参见故宫博物院编：《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四种》，故宫印刷所，民国二十三年（1934）九月三日。

2 《故宫已佚古物目录二种》（故宫丛刊之五），故宫博物院刊行，民国十九年（1930）。

3 庄蕴宽：《金薤留珍·序》，《金薤留珍》，故宫博物院传拓，民国十五年（1926）八月。

4 那志良：《故宫四十年》，第 24 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 年。

5 庄蕴宽：《金薤留珍·序》，《金薤留珍》，故宫博物院传拓，民国十五年（1926）八月。此后，《金薤留珍》又传拓了 20 部。

6 据民国十八年（1929）四月二十九日《古物馆送拓片十五种钤拓印谱两种转寄西湖博览馆暂时陈列》，将石印《金薤留珍》送交西湖博览馆暂时陈列，则在民国十八年前《金薤留珍》就已经影印发行。参见故宫博物院档案室藏：《故宫博物院·陈列展览类》第 6 卷，第 11 页，民国十八年（1929）四月二十九日。

7 马衡：《毓庆宫藏汉铜印·序》，《毓庆宫藏汉铜印》，故宫博物院传拓，民国十六年（1927）二月。

期刊的方式“先就清釐所得，随时刊布”，在内容上“皆就原文抄录”，在排列上“略以类从”，该刊还采录未刊布的掌故方面的书籍或罕见之书<sup>1</sup>。后来的文献馆甚至专门为《掌故丛编》建发售处，十七年（1928）七月出版的《读书堂西征随笔》就钤章“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掌故丛编总发售处”<sup>2</sup>。

此外，这一时期还出版了“故宫信片”、“故宫建筑明信片”等古建类出版物。

### （三）出版特色

北洋政府时期，故宫的管理机构变动频繁，经费紧张，整体事业举步维艰。在这种情况下，出版事业仍可圈可点。

#### 1. 出版事业处于起步阶段

清室善后委员会的点查类刊物、古物馆的传拓类刊物取得了相当的成就，而书画类、史料类、影印善本类、目录类等后来曾取得丰硕成果的刊物还未发展起来。出版业从总体上处于起步阶段。

#### 2. 点查类刊物有效地抵制了守旧、复辟势力

北洋政府时期，故宫博物院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其出版事业是为了维持、巩固故宫作为博物馆的地位，抵制守旧、复辟势力。卷帙浩繁的《故宫物品点查报告》向社会公开了宫廷藏品，也为清室善后委员会赢得了公开、透明的形象，有效地反击了守旧势力对善后委员会的诋毁。《甲子清室密谋复辟文证》、《故宫已佚书画目录三种》、《故宫已佚古物目录二种》等书，公布了逊清试图复辟的图谋以及变卖、盗窃故宫文物的行径，为驱逐溥仪出宫、清室善后委员会、故宫博物院的成立及运作赢得了道义支持。

## 三 民国故宫博物院出版的黄金时代：南京国民政府治理初期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时间跨度为北伐战争胜利的民国十七年（1928）六月至古物南迁前的二十二年（1933）一月，这一时期是民国故宫的黄金时代，与易培基掌院时期（十七年六月至二十二年六月）基本吻合。故宫与国民政府关系融洽，外部环境有利，内部组织架构两处（秘书处、总务处）三馆（古物馆、图书馆、文献馆）形成，故宫事业进入民国时代的鼎盛时期，出版事业也达到巅峰，编纂、印刷、发行机制形成，出版成果琳琅满目。

### （一）出版机制形成

故宫出版事业的编纂、印刷、发行机制在北伐胜利后、古物南迁前形成。

#### 1. 三馆两处的架构及其出版职能界定

民国十七年（1928）十月五日国民政府公布《故宫博物院组织法》，故宫博物院设秘书处、总务处、古物馆、图书馆、文献馆。《故宫博物院组织法》规定了秘书处之外的四个机构的出版职责：总务处“关于征集统计

1 《掌故丛编·凡例》，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掌故部编：《掌故丛编》（第一辑），和济印书局，民国十七年（1928）一月。

2 《读书堂西征随笔》，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掌故部编印，民国十七年（1928）七月。



图6 《本院出版物发行所服务规则》

材料及刊行出版物事项”，古物馆“关于古物传拓事项”、“关于古物摄影事项”，图书馆“关于善本图书影印事项”，文献馆“关于清代史料之编印事项”<sup>1</sup>。

## 2. 组建故宫印刷所

民国二十年（1931）之前，故宫的刊物都是委托院外机构印刷的，如十九年（1930），古物馆将夏珪《长江万里图卷》等六种书画寄沪影印。<sup>2</sup>

故宫博物院在民国十八年（1929）春间邀请杨心德来院担任摄影等技术工作，二十年（1931）春杨心德打算辞职专办私人印刷工厂。故宫主事者“为流传文化起见，需要精良印品”，于是提议与杨心德合作。二十一年（1932）订立官商合办契约，故宫印刷所因即成立<sup>3</sup>。印刷所选址神武门外一带的兵房，合伙人杨心德任技师、经理，他在用人行政有极大的自主权。故宫的刊物，是印刷所的基本生意。故宫印刷所的第一笔生意，就是承印《故宫周刊》。故宫印刷所是当时北平唯一的美术

印刷厂<sup>4</sup>，设公用部、铅印部、珂罗版部、石印部、凹版、制版部等部门<sup>5</sup>，可以从事铅印、珂罗版印刷、石印等<sup>6</sup>。

## 3. 出版物发售室改组为出版物发行所

民国十六年（1927）年底成立官办的出版物发售室，十八年（1929）十一月，出版物发售室改组，分为文书部、会计部、发售部、订购部<sup>7</sup>。二十一年（1932），由于本院出版事业蒸蒸日上，出版物发售室的流水金额大，在秘书吴瀛的操办下，为了减轻院款负担，决定“该室一切应用消耗开支即在营业项下支付，不入院款”<sup>8</sup>，即发售室从刊物销售款中提成作为开支，而不再由院拨经费。同年五月四日，院长易培基批准了由秘书处、出版处呈送的《改组发售室试行办法》，发售室改名发行所<sup>9</sup>，其性质由官办转变为官商合办<sup>10</sup>。〔图6〕

出版物发售室（发行所）还有联系本埠（北京）和外埠的故宫刊物代售机构的职责。

## 4. 出版处

出版物不见于《故宫博物院组织法》等法规文件，历年工作报告也不见出版处的工作统计，但故宫博物院档案室保存了出版处的相关档案。据二十一年（1932）五月四日的《改组发售室试行办法》，文件落款为秘书、

1 吴瀛：《故宫尘梦录》，第155～158页，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

2 《北平故宫博物院报告》，第19～20页，故宫博物院编印，民国十九年（1930）十二月。

3 《本院印刷所账目报告表》，故宫博物院档案室藏：《故宫博物院·财务类》第58卷，第53页，民国二十五年（1936）。

4 吴瀛：《故宫尘梦录》，第170～171页，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

5 《本院印刷所账目报告表》，故宫博物院档案室藏：《故宫博物院·财务类》第58卷，第61页，民国二十五年（1936）。

6 故宫博物院编：《故宫印谱日历》，故宫印刷所，民国二十一年（1932）。

7 《北平故宫博物院工作报告》，第23页，故宫博物院编印，民国十八年（1929）十二月。

8 《发售室一切消耗在营业项下支付由》，故宫博物院档案室藏：《故宫博物院·财务类》第223卷，第17～18页，民国二十一年（1932）四月八日。

9 《通知改组发售室试行办法由》，故宫博物院档案室藏：《故宫博物院·领导指导类》第37卷，第1～2页，民国二十一年（1932）五月四日。

10 民国二十一年（1932）八月二十六日，《本院出版物发行所服务规则》公布，主持事务者为主任，由故宫任命，“承故宫博物院之命，经理所务”，并对其官商合营性质进行了明确界定：“已偏重于商营业化，与官署性质自多不同”，“参照官商双方情形”，订定服务规则20条。参见：《本院出版物发行所服务规则》，故宫博物院档案室藏：《故宫博物院·领导指导类》第37卷，第6～8页，民国二十一年（1932）八月二十六日。

出版两处，秘书长李宗侗及吴瀛分别签字<sup>1</sup>。秘书、出版两处是以并列的方式呈现，据此可以推测，出版处的领导者是吴瀛。二十一年十月《故宫博物院古物馆概览》有“以上二表所列流传刊物，均归本院出版处发行所发售”<sup>2</sup>。可见，出版物发行所归出版处管理。

### 5. 拓展经费来源

北洋政府时期，故宫刊物经费来源为古物馆的拓片收入以及美国的庚子退款（由民国十三年（1924）成立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管理）。美款在十九年（1930）左右达到每年3万元规模<sup>3</sup>。

在江瀚任会长的维持会期间，曾拟议处分永寿宫银锭及金砂、消耗品茶叶作为经费，但被阻止。民国十七年（1928）易培基任院长后，故宫博物院向国民政府请求处分金砂、银锭及非文物的文化物品，得到批准，于是故宫将金砂、银锭、绸缎、皮货、食物（药材、火腿、茶叶等），通过标卖、拍卖、发售所零卖、在发行印品的发售室寄卖等方式出售，所得资金用于全院的事业，其中就有出版事业<sup>4</sup>。



图7 《故宫书画集》封面



图8 《故宫书画集》第1期刊载之《宋董源洞天山堂》

## （二）丰硕的出版成果

这一时期，古物、图书、文献三馆就各自所保管的文物、古籍、史料，印行了大量的刊物。秘书处则印行了院务和综合性刊物。

### 1. 古物馆的书画印谱类刊物

古物馆主要保管书画、瓷器、玉器、青铜器等古物。古物馆通过期刊、书法专集类、绘画专集类、信片类等刊物形式，传播故宫文化，远远超过了《故宫博物院组织法》所划定的古物馆的流传职能为“关于古物传拓事项”、“关于古物摄影事项”<sup>5</sup>的范畴。

古物馆的期刊类有《故宫》（月刊）、《故宫书画集》〔图7、图8〕、《故宫名扇集》。历朝的书画艺术品多影印专集发行，容量有限。为了广泛普及，出版《故宫》（月刊），创刊主编为总务处长俞星枢<sup>6</sup>，其内容分“建

1 《通知改组发售室试行办法由》，故宫博物院档案室藏：《故宫博物院·领导指导类》第37卷，第1~2页，民国二十一年（1932）五月四日。

2 《故宫博物院古物馆概览》，第21页，故宫博物院编印，民国二十一年（1932）十月。

3 民国十九年（1930），故宫博物院总务处曾致函《北平晚报》：“贵报登载《故宫的账算一算》一节与事实不符，本院据实更正，请照登来函由。（三）美款年拨三万元，经中美基金会指定作流传费（即印刷等费）按期查账，不能移作本院经常费或其他用费。（四）售品收入系美款所生产，亦入美款范围，不能作为院经常费。”参见《函民言报华北日报天公报益世报社更正载有本院文献馆存书运京以缓办与事实不符》，故宫博物院档案室藏：《故宫博物院·开放参观类》第16卷，第16页，民国十九年（1930）一月十五日。

4 吴瀛：《故宫尘梦录》，第170页，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

5 吴瀛：《故宫尘梦录》，第157页，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

6 吴瀛：《故宫尘梦录》，第169页，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



图9 《故宫名画竹集》封面



图10 《故宫名画竹集》刊登《宋文同墨竹》

筑、雕刻、书画、铜瓷器、史迹各类”<sup>1</sup>，打破了馆际界限，在院庆等特殊日子还发行特刊。从民国十九年（1930）开始，古物馆开始编辑《故宫》（月刊）<sup>2</sup>，二十一年（1932）完全接手<sup>3</sup>。《故宫书画集》创刊于十九年十月，用玻璃板精印书画名迹，按月发行，补充《故宫》（月刊）、《故宫周刊》的不足，向世界广泛传播中华书画艺术，“使一洗珍秘之习焉”<sup>4</sup>。《故宫名扇集》创刊于二十一年一月，专门刊印明清名家扇面，每月2期，出版到第9期时，易培基去职，该刊中断，直到二十四年（1935）三月出版第10期后停刊。这三种刊物每期发布20

件文物照片，《故宫》（月刊）、《故宫书画集》每件文物都配了说明，《故宫名扇集》只有作者人物小传。

古物馆的书法专集类有《宋四家墨宝》<sup>5</sup>、《唐明皇鹞鸽颂》<sup>6</sup>、《王右军三帖墨迹》<sup>7</sup>等。绘画专集类有《王原祁仿古山水册》<sup>8</sup>、《宋元画萃》<sup>9</sup>、《故宫名画竹集》<sup>10</sup>〔图9、图10〕等。书画单页类有《隋展子虔授经图》<sup>11</sup>、《隋郑法士观碑图》<sup>12</sup>等，手卷类有《宋朱锐赤壁图卷》<sup>13</sup>、《宋夏珪长江万里图卷》<sup>14</sup>等。上述书画作品的印刷方式多种多样，《宋四家墨宝》、《宋元画萃》铜版印刷，《唐明皇鹞鸽颂》为石印，其余的均为珂罗版印刷。纸张多为宣纸，部分书画用乾隆高丽纸，如《王右军三帖墨迹》、《宋朱锐赤壁图》就有高丽纸本。

古物馆信片类系列有《故宫书画信片》（名画、法书、扇面等）<sup>15</sup>〔图11〕、《故宫印谱日历》<sup>16</sup>〔图12〕等。《故

1 《故宫·凡例》（月刊），故宫博物院编：《故宫》（月刊）第1期，京华印书局，民国十八年（1929）九月。

2 《北平故宫博物院报告》，第19页，故宫博物院编印，民国十九年（1930）十二月。

3 据《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工作报告》（民国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古物馆在民国二十一年（1932）的刊印工作，有“《故宫》（月刊）第十九期至第二十四期共六期，每期五百册”的记载，而在此前的工作报告中，未见古物馆刊印刊物有《故宫》（月刊）。参见：《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工作报告》（民国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第20页，故宫博物院编印，民国二十三年（1934）。

4 易培基：《故宫书画集·序》，故宫博物院编：《故宫书画集》（第一期），京华印书局，民国十九年（1930）十月。

5 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编：《宋四家墨宝》，京华印书局，民国十九年（1930）四月。

6 故宫博物院编：《唐明皇鹞鸽颂》，京华印书局，民国二十一年（1932）一月。

7 《王右军三帖墨迹》，故宫博物院编印，民国二十一年（1932）九月。

8 故宫博物院编：《王原祁仿古山水册》，故宫印刷所，民国二十一年（1932）六月。

9 故宫博物院编：《宋元画萃》（第一册“花鸟”，第二册“山水”），京华印刷局，民国二十三年（1934）前出版。

10 故宫博物院编：《故宫名画竹集》（第一册），故宫印刷所，民国二十二年（1933）三月。

11 《隋展子虔授经图》，故宫博物院编印，约民国二十一年（1932）。

12 《隋郑法士观碑图》，故宫博物院编印，约民国二十一年（1932）。

13 《宋朱锐赤壁图卷》，故宫博物院编印，民国二十一年（1932）一月。

14 《宋夏珪长江万里图卷》，故宫博物院编印，民国二十一年（1932）八月。

15 《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工作报告》（民国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第22页，故宫博物院编印，民国二十三年（1934）。

16 故宫博物院编：《故宫印谱日历》，故宫印刷所，民国二十一年（1932）。



图 11 《故宫书画信片》(第一辑)之《元赵孟頫画马》



图 12 《故宫印谱日历》封面 余宁川拍摄



图 13 《柳贯上京纪行诗一卷》卷端

宫书画信片》前后共发行 13 辑，铜版或珂罗版印刷，以每盒 100 张或每组 20 张两款售卖。《故宫印谱日历》精选了《金薤留珍》谱内的秦汉私印 732 方。

## 2. 图书馆的影印善本及排印书目

图书馆保管各宫殿之书以及杨守敬观海堂藏书、方略馆、资政院、清史馆藏书，其出版工作围绕善本影印与目录两个方面。

《故宫博物院组织法》对图书馆的出版职能界定是“关于善本图书影印事项”<sup>1</sup>，这一阶段图书馆影印成果有《故宫善本书影初编》<sup>2</sup>、《淮海居士长短句》(词集)<sup>3</sup>、《柳贯上京纪行诗一卷》(诗集)<sup>4</sup>〔图 13〕、《太平清调伽陵音一卷》(散曲)<sup>5</sup>、《射阳先生存稿》(诗文集)<sup>6</sup>、《明史本纪》(以乾隆四十二年(1777)补纂的殿本影印)<sup>7</sup>和《天禄琳琅丛书》(清代宫廷藏书)<sup>8</sup>，其中，《天禄琳琅丛书》达 15 种 115 卷，共 28 册。

目录方面，编印的有《故宫方志目》<sup>9</sup>、《故宫所藏观海堂书目》<sup>10</sup>。此后出版的《故宫殿本书库现存目》、《故

1 吴瀛：《故宫尘梦录》，第 158 页，紫禁城出版社，2005 年。

2 《故宫善本书影初编》，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影印，民国十八年(1929)六月。该书版权页未登载印刷机构，但据《北平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概况》(故宫博物院编印，民国二十年(1931)十月)，《故宫善本书影初编》是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刷的。

3 (宋)秦观：《淮海居士长短句》，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影印，民国十九年(1930)四月。

4 (元)柳贯：《柳贯上京纪行诗一卷》，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编，京华印书局，民国十九年(1930)四月。“上京纪行诗”以元代塞上草原开平地区建立的上都为歌咏内容，是元诗乃至整个中国诗史上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众多诗人创作了这一题材的诗歌。参见李军：《论元代的上京纪行诗》，《民族文学研究》2005 年第 2 期。

5 (明)叶华：《太平清调伽陵音一卷》，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印行，民国十九年(1930)六月。

6 (明)吴承恩：《射阳先生存稿》，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印行，民国十九年(1930)七月。

7 《明史本纪》，故宫博物院编印，民国二十一年(1932)四月。

8 《天禄琳琅丛书》，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编印，民国二十一年(1932)。

9 《故宫方志目》，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编印，民国二十年(1931)八月。

10 何澄一编：《故宫所藏观海堂书目》，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印行，民国二十一年(1932)九月。



图 14 《史料旬刊》(第一期)封面



图 15 《史料旬刊》(第一期)目录

宫所藏殿板书目》、《故宫善本书目》、《故宫普通书目》是在这一阶段编辑的。

### 3. 文献馆的史料类刊物

文献馆保管档案(宫中档、军机档)、书册(实录、圣训、起居注)、图像(帝后像、明贤名臣像)、册宝、冠服等。这一时期文献馆刊物大致分目录、定期刊物、史料、图籍五类。

目录类有《清军机处档案目录》<sup>1</sup>、《雍正朱批谕旨不录奏折总目》(雍正、乾隆两朝未刊行的雍正朝奏折)<sup>2</sup>。

定期刊物方面,前期创办的《掌故丛编》,在民国十九年(1930)三月更名为《文献丛编》,改名启事谓:“内容材料,比前加增,

书价照旧。”<sup>3</sup>《文献丛编》还出版了增刊《清三藩史料》(共6辑)和专刊《朝鲜迎接都监都厅仪轨》<sup>4</sup>。文献馆的另一种刊物为《史料旬刊》,创刊于十九年六月。关于《史料旬刊》的创办情形,朱家潘回忆,陈垣(援庵)先生主张尽快公布档案史料,供学术界研究,在《掌故丛编》之外,又编印《史料旬刊》[图14、图15]。援庵先生认为:“公布档案史料不必耽搁时间,搜寻某一历史时间的全部档案,根据档案原来次序发排,十天出版一册,如果原来档案不缺的话,将来总会出齐的;采用线装,可以给不同读者根据不同需要时拆散重装。”<sup>5</sup>《史料旬刊》二十年(1931)七月停刊,共出版了40期。

文献馆的史料类出版物蔚为大观,主要是清宫系列外交史料。民国十九年(1930)二月,李宗侗在《清代筹办夷务始末·校印后记》(道光朝)记述,清代已经编好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筹办夷务始末》,现今道光朝已经印好,咸丰、同治两朝即将陆续出书。至于道光以前以及光绪、宣统两朝的外交史料,“则院藏之军机处洋务档奏折档具在,亦将用以编成前编及后编,俾清代外交史料得有全书。其于不平等条约之废除,或者不无小补”<sup>6</sup>。由此可见,在故宫主事者心目中有一个庞大的史料出版计划,可以为废除不平等条约提供

1 《清军机处档案目录》,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印,民国十九年(1930)。

2 《雍正朱批谕旨不录奏折总目》,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印,民国十九年(1930)。

3 《文献丛编启事》,《文献丛编》(第一辑),和济印刷局,民国十九年(1930)三月。

4 《文献丛编增刊——清三藩史料》,故宫博物院编印,民国二十年(1931)至二十一年(1932);《朝鲜迎接都监都厅仪轨》(《文献丛编》专刊),故宫博物院编,民国二十一年(1932)一月。民国二十年,文献馆整理清内阁大库档案,在东库发现康熙朝三藩事件之文书千余件,将其中的各将军府文档、割付令牌及印记、各部院钞送内阁典籍厅之题本排印为《清三藩史料》(共6辑)出版。文献馆还在内阁大库发现明代朝鲜迎接都监都厅仪轨二册,一为万历三十六年(1608)朝鲜王李昰冲卒中国遣使赐祭事;一为天启元年(1621)熹宗登极颁诏朝鲜事,文献馆将前者发表于《文献丛编》,后者刊行专册为《朝鲜迎接都监都厅仪轨》。

5 朱家潘:《回忆陈垣、沈兼士两位先生》,《紫禁城》1986年第5期。

6 李宗侗:《清代筹办夷务始末·校印后记》(道光朝),(清)文庆等编:《清代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故宫博物院影印,民国十八年(1929)。

支持。此后,《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sup>1</sup>、《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sup>2</sup>、《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sup>3</sup>、《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sup>4</sup>、《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sup>5</sup>、《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sup>6</sup>、《清宣统朝中日交涉史料》<sup>7</sup>相继密集出版。其中,《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引言部分特意记述其出版要“补《筹办夷务始末》一书之不足”<sup>8</sup>。除系列外交史料外,文献馆还编印了《清代文字狱档》(共9册)<sup>9</sup>。

图籍类有《交泰殿宝谱》(收录交泰殿二十五宝的钤印,并附印文和印体描述)<sup>10</sup>[图16]、《清代帝后像》(共4期,收录景山寿皇殿与宫内所藏清朝历代帝后画像及行乐图共120幅)<sup>11</sup>、《清乾隆内府舆图》(清乾隆时绘制的全国地图,共104幅)<sup>12</sup>等。

这一时期,文献馆还影印了《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图17、图18],民国二十年(1931)《文献丛编》第6辑曾照康熙改稿排印,因“阅者以为未见原稿为憾”,再照原稿影印<sup>13</sup>。

#### 4. 秘书处出版物

《故宫博物院组织法》并未规定秘书处的出版职责,但秘书处负责编纂院务刊物以及综合性刊物。据1929年《北平故宫博物院工作报告》,秘书处编印刊物有《故宫物品点查报告》(部分)、《故宫已佚古物目录二种》(编好未出版)、《故宫周刊》(一至十二期)等<sup>14</sup>。民国十九年(1930)《北平故宫博物院报告》载秘书处编印刊物有《故宫已佚古物二种》(出书)、《故宫周刊》、《史料旬刊》(由文献馆与秘书处合办)等<sup>15</sup>。二十三年(1934),秘书处移交出版物及瓷器等物,计有《清史稿》共28部、《处分无关文史物品经过概况》共1397本、《处分皮货售出清单》[图19]共450本、《处分残废金质器皿经过情形》共450本<sup>16</sup>。后面3种书



图16 《交泰殿宝谱》之“大清受命之宝”钤印

1 (清)贾桢等编:《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故宫博物院影印,民国十九年(1930)。  
 2 (清)宝鋐等编:《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故宫博物院影印,民国十九年(1930)。  
 3 《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故宫博物院编印,民国二十一年(1932)。  
 4 《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故宫博物院编印,民国二十一年(1932)至二十二年(1933)。  
 5 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民国二十一年(1932)三月。  
 6 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民国二十一年(1932)十月。  
 7 故宫博物院编:《清宣统朝中日交涉史料》,民国二十二年(1933)二月。  
 8 《清代外交史料·引言》(嘉庆朝),《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故宫博物院编印,民国二十一年(1932)。  
 9 《清代文字狱档·编辑略例》,《清代文字狱档》,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印,民国二十年(1931)五月。  
 10 《交泰殿宝谱》,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印,民国十八年(1929)。  
 11 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清代帝后像》(1~4期),京华印书局、故宫印刷所,民国十八年(1929)至二十二年(1933)。  
 12 《清乾隆内府舆图》,故宫博物院编印,民国二十一年(1932)。  
 13 陈垣:《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叙录》,《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故宫博物院编,民国二十一年(1932)三月。  
 14 《北平故宫博物院工作报告》,第15页,故宫博物院编印,民国十八年(1929)十二月。  
 15 《北平故宫博物院报告》,第8页,故宫博物院编印,民国十九年(1930)十二月。  
 16 《秘书处移交出版物及瓷器等物清册》,故宫博物院档案室藏:《故宫博物院·文物保管类》第88卷,第11页,民国二十三年(19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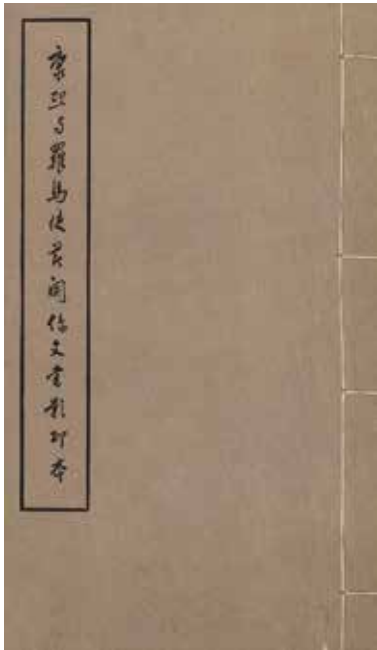


图 17 《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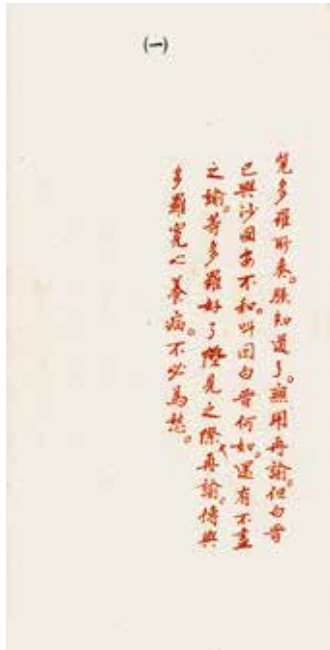


图 18 《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康熙帝朱笔



图 19 《处分皮货售出清单》封面

都是秘书处出版的。二十一年（1932）八月出版的《故宫博物院五年经过记》<sup>1</sup>也当为秘书处的出版物，该书先在《故宫周刊》连载，后集结出版。

### （三）出版特点

故宫博物院在民国鼎盛时期的出版事业，主事者为宣扬文化，积极进取，出版事业具有以下特点：

#### 1. 形成了品类丰富的出版物体系

这一时期，本院的中坚骨干对出版业不仅有宏伟而清晰的规划，而且有较强的行动力。秘书吴瀛后来回忆，这一时期，他与秘书长李宗侗有一个宏大的计划，“想有一个 10 年或 5 年的计划，将所有本院文物完全摄制了副本流传，做一个既可普及又便保存稽考之助”<sup>2</sup>。上文所述李宗侗在《清代筹办夷务始末·校印后记》（道光朝）所提及的出版清代系列外交史料的计划，其思路也宏大而清晰。

在主事者的积极推动下，院内与出版相关的机构各司其责，经过不懈努力，一改北洋政府时期本院只有点查类、拓印类刊物较有成就的状况，期刊密集创刊，故宫的刊物（或连续出版物）中，除《掌故丛编》创刊于民国十七年（1928）一月，《故宫旬刊》创刊于二十五年（1936）五月，其余的刊物，《故宫》（月刊）、《故宫周刊》、《史料旬刊》、《故宫书画集》、《故宫名扇集》等 5 种刊物，均诞生在十八年（1929）至二十一年（1932）。相对于专著，期刊需要持续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期刊密集创刊，反应了故宫此时生机勃勃的状态。此外，书画专集类、史料类、史籍类、影印善本类、目录类等各类刊物也争奇斗艳，构成了品类丰富，内容、类型

1 吴瀛：《故宫博物院五年经过记》，故宫博物院印行，民国二十一年（1932）八月。

2 吴瀛：《故宫尘梦录》，第 169 页，紫禁城出版社，2005 年。

互补的出版物体系。

## 2. 出版与文物（文献）的整理、展陈结合

在北洋政府时期，故宫出版业反映了文物点查的成果，《故宫物品点查报告》向社会公布了故宫“有什么”。而随着文物（文献）整理的深入，这一时期的出版，通过各种期刊以及书画、史料、史籍类刊物，向公众展示了故宫的文物、文献等“是什么”。而故宫刊物无疑优先发表展厅展示的文物（文献）精品。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本院出版与文物（文献）整理、展陈是互相促进、良性循环的关系。

## 3. 出版物发行范围广，社会影响大

故宫收藏的历代珍藏以及清宫文献等以刊物的形式向社会广泛传播，受到了社会公众的热烈欢迎，出版物发行范围扩大，社会影响力急剧上升。我们可以从销售角度了解到故宫刊物受欢迎程度。出版物发售室在民国二十一年（1932）改组为官商合营的出版物发行所，其基本的前提是刊物销量大，依靠刊物销售提成就能维持运营，不再需要院里拨款。如十九年（1930），每月发售室收发订购书籍接洽函件，平均每月有150件，市内外代售处计27处，含本市景山书社、直隶书局、商务印书馆等20处，外埠上海中国书店、南京有正书局、四川成都现代文化社等7处，分销处2处，分别为天津法租界庆丰里1号，本院南京驻京办公处。全年刊物销售量达62413册，照片、明信片、《故宫周刊》、拓片的销售量还未统计在内<sup>1</sup>。

## 4. 刊物出版水平精良

这一时期刊物不仅编校水平高，而且印刷质量、纸张、装帧、插图等都远胜后期刊物，尤其是抗战期间出版的刊物。如该阶段出版的史料类刊物《筹办夷务始末》，天头、地角留白多，纸张为高质量的宣纸，铅印字体大，字迹清晰，装帧精良；而在抗战时期出版的《清宫述闻》，其印刷、纸张、装帧质量都因陋就简。

# 四 民国故宫博物院出版的守成阶段：古物南迁时期

古物南迁时期的时间跨度为民国二十二年（1933）二月至二十六年（1937）六月，共四年零两个月。二十年（1931）九月，日本在东北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平津震动，为了故宫国宝的安全，经过政府的核准，故宫博物院未雨绸缪，决定古物南迁。二十二年二月到五月，故宫古物分五批运到了上海。七月，马衡任院长（1952年5月22日卸任，任职达20年）。二十五年（1936）十二月，存沪文物运往南京，二十六年一月，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成立。不久，全面抗战爆发。

这一时期，故宫精华古物装箱南运，故宫同仁南北奔波，人员分散；而伴随古物南迁始终的“易培基盗宝案”，也导致人事剧烈动荡，这些因素都限制了故宫整体事业的发展。从总体上看，南迁时期出版事业是上一阶段辉煌的惯性发展。《故宫》（月刊）、《故宫周刊》等刊物仍次第发行，书画影印、文献及图书编目成就就可圈可点，经过数年的积累，本院年轻学者崭露头角，开始发表研究著作。

1 《北平故宫博物院报告》，第15页，故宫博物院编印，民国十九年（1930）十二月。

## （一）机构变迁

南迁时期，院内机构重组，必然引起出版职能的调整。出版处撤销、印刷所逐渐衰落，本院出版事业已缺乏强劲发展动力。而在上海建立摄影室，保证了在精华文物南迁的情况下，本院刊物还有高质量的影片可用，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南迁时期出版事业的下降态势。

### 1. 机构重组

民国十七年（1928）十月五日公布的《故宫博物院组织法》，故宫博物院设秘书处、总务处、古物馆、图书馆、文献馆，各馆相应承担出版职责，该组织架构在二十二年（1933）“易培基盗宝案”发酵后发生改变，据二十三年（1934）十月二日行政院所颁布的《修正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暂行组织条例》，故宫博物院设总务处、古物馆、图书馆、文献馆，撤销了秘书处（其大部分职能由总务处接管）。一处三馆出版职能分别是，总务处“关于出版事项”，古物馆“关于古物之传拓摄影事项”、“关于古物之刊行事项”，图书馆“关于善本图书之影印流传事项”，文献馆“关于明清史料之搜集整理及编印事项”、“关于历史物品之分类摄影及编印事项”<sup>1</sup>。

秘书处撤销后，总务处的出版职责扩大。古物、图书、文献方面的刊物由各馆分别编印，“其属于一般者，由本处（即总务处）职员于公余随时编印”<sup>2</sup>，此后，历年全院工作报告出版部分在罗列古物馆、图书馆、文献馆出版成果后，再列“属于一般者”，即总务处的出版成果。如民国二十五年（1936）的全院工作报告，“属于一般者”有“二十五年年刊一千本”、“修正《增订故宫图说》三千本”、“《章制汇编》及补印《续订规则》五百份”<sup>3</sup>等出版方面的内容。

本院还成立了太庙图书分馆，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六月九日对外开放。

### 2. 出版处撤销

民国二十二年（1933）底或者二十三年（1934）初，出版处撤销。二十三年一月七日总务处向秘书处发两函，其一为“奉院长条谕：‘本院前出版处既已取消，所有《故宫周刊》编辑事宜应即移交古物馆办理，仍由秘书吴瀛主编’”<sup>4</sup>，其二为“奉院长条谕：‘本院前出版处既已取消，所有该处人员侯植忠……（共14人）应即停职’”<sup>5</sup>。从这两条关于出版处的档案看，《故宫周刊》为出版处刊物，而据上文，十八年（1929）、十九年（1930），《故宫周刊》为秘书处刊物，可见，《故宫周刊》先挂靠在秘书处，后来转到了出版处。出版处职员至少有14人，规模也不算小。

1 《修正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暂行组织条例》（民国二十三年（1934）十月二日），《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章制汇编》，第2页，故宫博物院编印，二十五年（1936）三月。对比十七年（1928）十月五日公布的《故宫博物院组织法》，规定的各机构出版职责，总务处“关于征集统计材料及刊行出版物事项”，古物馆“关于古物传拓事项”、“关于古物摄影事项”，图书馆“关于善本图书影印事项”，文献馆“关于清代史料之编印事项”（吴瀛：《故宫尘梦录》，第155～158页，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可以发现各馆的出版职能有调整。古物馆增加了“关于古物之刊行事项”，文献馆增加了明代史料的编印以及历史物品的编印事项（如印谱、画像等）的职责。这些新增职能只是“追认”了古物馆、文献馆前期的实际出版品类。

2 《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工作报告》，第14页，故宫博物院编印，民国二十四年（1935）。

3 《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工作报告》，第45页，故宫博物院编印，民国二十五年（1936）。

4 《为前出版处已取消〈故宫周刊〉编辑事宜移交古物馆办法》，故宫博物院档案室藏：《故宫博物院·编辑出版类》第63卷，第2页，民国二十三年（1934）一月七日。

5 《前出版处所有人员侯植忠等应即停职》，故宫博物院档案室藏：《故宫博物院·编辑出版类》第63卷，第4页，民国二十三年（1934）一月七日。

### 3. 故宫印刷所衰落

官（故宫博物院）商（杨心德）合办的故宫印刷所在民国二十一年（1932）成立后，当年六月结算赢利9000余元，二十二年（1933）一月故宫官方还增加资本44000元，可见当时的发展态势好，后因印品减少，营业成绩不好，于二十五年（1936）六月间清算账目<sup>1</sup>，院方定《印刷所悬案解决办法》，对其中的一些经济纠纷，分别认定院方与所方的责任<sup>2</sup> [图20]。二十六年（1937）一月十四日，院长马衡向院理事会提议拨付1万元收买故宫印刷所商股，并获准<sup>3</sup>。若这项收购最终完成，则故宫印刷所就从官商合办的企业转变为故宫博物院的直属单位。但因为资金困难，直到抗战爆发，还没有完成对印刷所商股的收购<sup>4</sup>。为了躲避战乱，故宫印刷所的主要设备在抗战前也南迁了，目前找不到故宫印刷所南迁后的资料。而留在北平的印刷所物品，则被故宫接收<sup>5</sup>。



图20 《印刷所悬案解决办法》

### 4. 在上海建摄影室

民国二十二年（1933）春季古物南迁上海后，九月，因中央图书馆筹备处借印故宫的四库全书，故宫向行政院申请在库房外搭建临时房进行拍摄<sup>6</sup>。此后，北平本院（主要是古物馆）每月向上海提出摄影需求，照片拍好后，再寄回北平利用。年度工作报告也分别统计在平摄影与在沪摄影，如二十五年（1936）《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工作报告》，古物馆摄印照片部分，在平摄印书画、铜器、瓷器、玉器、杂项等共116种1055张，其中在沪摄印书画铜器照片238种1510张<sup>7</sup>。因精华古物多南迁，在沪摄影比在平摄影还多。

## （二）出版成果

这一阶段的出版成果，大体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前一阶段黄金时代的延续，另一部分是本阶段新的成果，当然，这两者的界限有时比较模糊。

### 1. 延续性成果

延续性成果包括：前期创刊的各种期刊次第出版；因印行需要周期，前期编好的著作在这一阶段才出版；内容虽是这一时期编纂，但前期已有类似出版物。

- 1 《本院印刷所帐目报告表》，故宫博物院档案室藏：《故宫博物院·财务类》第58卷，第53页，民国二十五年（1936）。
- 2 《印刷所悬案解决办法》，故宫博物院档案室藏：《故宫博物院·财务类》第58卷，第77～78页，民国二十五年（1936）。
- 3 《收买印刷所商股动支基金特缮具请款单》，故宫博物院档案室藏：《故宫博物院·财务类》第82卷，第1～3页，民国二十六年（1937）一月十四日。
- 4 《退还前印刷所商股及清偿债务各款》，故宫博物院档案室藏：《故宫博物院·财务类》第82卷，第51页，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六月二十六日。
- 5 《故宫印刷所原存平残旧物品》，故宫博物院档案室藏：《故宫博物院·行政事务类》第94卷，第22～23页，民国三十八年（1949）。
- 6 《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影印〈四库全书〉现将摄照等由》，故宫博物院档案室藏：《故宫博物院·档案图书文书类》第33卷，第18页，民国二十二年（1933）九月四日。
- 7 《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工作报告》，第40～41页，故宫博物院编印，民国二十五年（1936）。



图21 《黄庭坚书松风阁诗》内页

期刊方面，古物馆前期负责的各种刊物在南迁时期继续发行，但又陆续停刊：《故宫名扇集》（共10期），民国二十四年（1935）三月停刊；《故宫》（月刊，共44期）二十五年（1936）停刊，《故宫书画集》（共47期）二十六年（1937）上半年停刊，二十三年（1934）接手的《故宫周刊》（共510期）于二十五年（1936）五月改为《故宫旬刊》。《故宫》（月刊）和《故宫周刊》仍发行周年特刊，如二十三年（1934）《故宫》（月刊）特刊《唐陆柬之书陆机文赋》，《故宫周刊》特刊《陆治蔡羽书画合璧》，二十四年（1935）《故宫》（月刊）特刊《米芾诗牍》，《故宫周刊》特刊《唐徐浩书朱巨川告身》。文献馆的《文献丛编》一直都在陆续出版。

前期编好的书籍出版情况：图书馆在民国二十二年（1933）至二十三年（1934）出版了系列书目《故宫所藏殿板书目》<sup>1</sup>、《故宫殿本书库现存目》（共3册）<sup>2</sup>、《故宫善本书目》<sup>3</sup>、《故宫普通书目》（共3册）<sup>4</sup>，还与国立北平图书馆联合出版了《满文书籍联合目录》<sup>5</sup>。文献馆出版了《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现存清代实录总目》<sup>6</sup>、《重整内阁大库残本书影》<sup>7</sup>、《内阁大库现存清代汉文黄册目录》（黄册为有关赋役财政的账簿）<sup>8</sup>等。

内容虽是这一时期编纂，但前期已有类似成果的有：古物馆影印书画集，如《宋拓道因法师碑》（珂罗版）<sup>9</sup>、《宋徽宗池塘秋晚图》（珂罗版并套色石印）<sup>10</sup>、《黄庭坚书松风阁诗》[套色石印，图21]<sup>11</sup>、《明宣宗书画合璧》<sup>12</sup>等。图书馆排印史籍《史记校》<sup>13</sup>，影印由商务印书馆订印的《四库珍本》321种、《宛委别藏》40种。<sup>14</sup>文献馆影印《批本处现行事宜》<sup>15</sup>、排印《清内阁库贮旧档辑刊》（共6辑）<sup>16</sup>、《升平署岔曲》<sup>17</sup>、《升平署月令承应戏》<sup>18</sup>、《朝鲜国王来书》<sup>19</sup>、《清季各国照会目录》<sup>20</sup>等。

1 《故宫所藏殿板书目》，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编印，民国二十二年（1933）三月。

2 陶湘编：《故宫殿本书库现存目》，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印行，民国二十二年（1933）八月。

3 张允亮编：《故宫善本书目》，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印行，民国二十三年（1934）一月。

4 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编：《故宫普通书目》，故宫印刷所，民国二十三年（1934）。

5 李德启编、于道泉校：《国立北平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满文书籍联合目录》，大北印刷局，民国二十二年（1933）六月。

6 张国瑞编：《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现存清代实录总目》，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印行，民国二十三年（1934）十一月。

7 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重整内阁大库残本书影》，故宫印刷所，民国二十二年（1933）十月。

8 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内阁大库现存清代汉文黄册目录》，故宫印刷所，民国二十五年（1936）四月。

9 故宫博物院编：《宋拓道因法师碑》，故宫印刷所，民国二十二年（1933）六月。

10 故宫博物院编：《宋徽宗池塘秋晚图》，故宫印刷所，民国二十三年（1934）五月。

11 故宫博物院编：《黄庭坚书松风阁诗》，故宫印刷所，民国二十二年（1933）八月。

12 故宫博物院编：《明宣宗书画合璧》，彩华印刷局，民国二十五年（1936）十月。

13 《史记校》，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校印，民国二十四年（1935）十二月。

14 《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工作报告》（民国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第45页，故宫博物院编印，民国二十三年（1934）。

15 《批本处现行事宜》，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印，民国二十六年（1937）八月。

16 方甦生等编：《清内阁库贮旧档辑刊》，故宫印刷所，民国二十四年（1935）。

17 《升平署岔曲》，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印行，民国二十四年（1935）十月。

18 《升平署月令承应戏》，故宫博物院印行，民国二十五年（1936）十月。

19 《朝鲜国王来书》，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校印，民国二十二年（1933）二月。

20 张德泽等编：《清季各国照会目录》，故宫印刷所、和济印书局、文雅社，民国二十四年（1935）至二十五年（1936）。

## 2. 开创性成果

这一阶段最大的开创性成果是涌现了一批研究论著，北伐胜利故宫博物院工作走向正轨之后，工作重心在于整理、发表秘藏史料、文物等，而到了南迁时期，在已发布大量的资料性刊物的情况下，故宫同仁逐步撰写研究性文章，民国二十四年（1935）《文献特刊——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十周年纪念》刊发了陈垣先生《记吕晚村子孙》等7篇署名文章与6篇未署名工作报告与论文<sup>1</sup>，二十五年（1936）出版了《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年刊》（5篇论文，2篇纪实文章，均署名）<sup>2</sup>、《文献论丛——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成立十一周年纪念》（24篇署名文章）<sup>3</sup>，后两种书还分别出版了抽印本。

民国二十五年（1936）五月古物馆将《故宫周刊》改刊为《故宫旬刊》[图22]，二十六年（1937）下半年停刊，共出32期。《故宫旬刊》与《故宫周刊》相比，存在一些差别：“内容益求精采，考订更期详贍，图片文字壁垒一新，不与周刊相复。”<sup>4</sup>太庙图书分馆编纂《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太庙图书分馆书目初编》<sup>5</sup>，这是太庙图书分馆成立后编纂的有分量的一部书。图书馆排印的《启祯野乘》，编纂过程颇为曲折：“故宫藏本原缺八页，兹从顺德李氏藏本补钞四叶，从国学图书馆藏本补钞三叶。惟第七卷蔡巡抚穿尚有缺字，末由补钞，诚为憾事。”<sup>6</sup>文献馆编纂《整理档案规程》，将档案整理工作规范化<sup>7</sup>，《故宫俄文史料》，注意到了外文外交史料的价值<sup>8</sup>。



图22 《故宫旬刊》（第二期第一版）

### （三）出版特点

南迁时期的出版，是前一阶段出版的惯性发展，各项制度较前期更为完善。

#### 1. 黄金时代的惯性发展

因北伐胜利后、至古物南迁前故宫出版事业高度繁荣，在南迁时期，虽有文物装箱、人员分散等种种不利因素，但出版事业保持了延续态势，出版成果也非常丰硕，但从趋势上看已处于急剧衰退之中，如上文所述，各种期刊基本上都是在这一阶段停刊。

#### 2. 各项制度更为完善

经过数年的发展，故宫博物院的管理越来越规范化，出版事业也是如此。民国二十四年（1935）十一月

1 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辑会：《文献特刊——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十周年纪念》，北京书局，民国二十四年（1935）。

2 《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年刊》，故宫博物院编印，民国二十五年（1936）七月。

3 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辑会：《文献论丛——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成立十一周年纪念》，北京书局，民国二十五年（1936）。

4 《故宫旬刊·启事》，《故宫旬刊》（第一期），北平京城印书局，民国二十五年（1936）五月一日。

5 《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太庙图书分馆书目初编》，故宫博物院太庙图书分馆印行，民国二十六年（1937）七月。

6 《启祯野乘》，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校印，民国二十五年（1936）十二月。

7 《整理档案规程》，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印，民国二十五年（1936）六月。

8 王之相中文翻译、刘泽荣俄文编辑：《故宫俄文史料》，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印刷部，民国二十五年（1936）十月。

一日颁布了总务处、古物馆、图书馆、文献馆的《办事细则》，对刊物定价（如古物馆的定价原则是：“本馆刊物应按成本比例拟定售价，呈准馆长核定发售”）<sup>1</sup>、版权保护（如文献馆规定，第二科编印股编先就各项刊物稿件预定出版日期，交印刷所限期印刷，出版后送交文献馆点收记账，“送请总务处钤盖版权”）<sup>2</sup>、文物摄影（如古物馆规定了北平摄影与在上海摄影之流程：“凡编纂应用之物品，在北平本院者，得按照出组手续提取摄影室摄影，在上海保存者得开单函请驻沪办事处检原件摄影，将照片送交本馆第二科分类登记”）<sup>3</sup>等都做了明确的规定。

此外，研究论著不断涌现，也是南迁期间故宫出版的一大特色。

## 五 民国故宫博物院出版的衰败：抗战时期

抗战时期的时间跨度为民国二十六年（1937）七月至三十四（1945）八月，达八年之久。这一时期，故宫南北隔绝，北平本院处于留守状态，经费奇缺；南迁文物则向西疏散，一路奔波，躲避战火。出版事业急剧衰落。

### （一）院中体制

#### 1. 南北隔绝

民国二十六年（1937）七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平津沦陷，故宫北平本院与南京分院南北隔绝，年底，南京陷落，故宫南迁古物向西疏散到贵州安顺及四川乐山、峨眉等三处。

抗战期间，院内主要人员离开北平，总务处长张庭济等留守，职员队伍保持了稳定，文物及各项事业仍照以前成例进行。民国三十一年（1942）六月，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接管故宫博物院，任命祝书元为代理院长。<sup>4</sup>疏散到后方的本院首脑机关，已不能维持旧时院中体制，改为战时临时体制，马衡院长及总办事处驻在重庆。

北平本院的各项工作，包括编著与出版事业，陷入了停滞与维持状态。因经费和材料短缺，古物、图书、文献三馆所编印的书刊，大多不能出版，只印行少量刊物、书画，其中大部分书画为重版。而在后方，古物、人员处于流离状况，条件艰辛，出版物更少。

#### 2. 出版物发行所改回院办出版物发售室

1932年，出版物发售室改为官商合营的发行所，这次改组的基本前提是刊物销量大，销售款多，依固定

1 《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古物馆办事细则》（民国二十四年（1935）十一月一日），《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章制汇编》，第17页，故宫博物院编印，民国二十五年（1936）三月。

2 《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办事细则》（民国二十四年（1935）十一月一日），《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章制汇编》，第22页，故宫博物院编印，民国二十五年（1936）三月。

3 《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古物馆办事细则》（民国二十四年（1935）十一月一日），《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章制汇编》，第17页，故宫博物院编印，民国二十五年（1936）三月。

4 抗战期间北平本院的情况，马衡先生总结为：“在北平沦陷以后，我们留守的全部人员，处境极为艰困。当时我在南京，请示于行政院。经提出第三三五次院会决定，令于可能范围内尽力维持。当时虽没有‘地下工作’的名词，实际上就是奉命维持。在这八年之中，前五年完全由留守人员苦心孤诣的妥为应付。后三年，虽伪政府派有主持的人，实际上仍由留守人员保管。不幸有一部分铜缸，被敌伪劫掠已去，其余文物幸得保全。”施安昌、华宁释注：《马衡日记附诗抄——1949年前后的故宫》，第275页，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

比例提成的收入能够维持运营，但在抗战期间，刊物销售清淡，售款提成估计已经不能维持其正常运营。民国二十六年（1937）九月，月销售额只有 288.23 元<sup>1</sup>。官商合办入不敷出，只能改为故宫的官办机构。三十二年（1943）六月，发行所又改为院办发售室，“以前刊物发行所系招商承办，自三十二年六月收归院办，改为出版物发售室。所有本院出版物及处分物品（如茶叶等）发交该室出售”<sup>2</sup>。

### 3. 北平本院的出版经费

抗战期间，经费异常困难。北平本院曾向伪财务总署借款充作出版经费，刊物售卖后每月还款。民国二十九年（1940）十一月十一日，故宫函财物总署“本院由贵署垫款项下刊印之出版物十月售价现已结算完毕，计收支款一百七十五元三角五分”，故宫填具解款凭单及出版物发售表各一件，连同款项缴送到伪财务总署<sup>3</sup>。此外，北平本院还由伪政府担保，向中联银行借款，三十二年（1943）十二月故宫将当月售书款解送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再由其将款项解缴中联银行，手续完毕后，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曾向故宫博物院下达类似于收据的函令：“卅二年度十二月出版物售价归还垫款计一千九百八十八元三角四分，已解缴中联银行照收。”<sup>4</sup>

## （二）出版物概况

抗战期间，故宫人员南北隔绝，编纂人手短缺，也不可能像南迁期间那样在上海拍摄南迁精华文物影像，再寄回北平印行刊物，因此，文物类刊物多为重印，古物馆、图书、文献三馆也有少量的初印刊物。

### 1. 初印刊物

古物馆初印刊物有铜版印《故宫旬刊》（第 41—44 期），此外还影印《宋贤书翰》（民国二十六年（1937 年）八月）、《明卞文瑜摹古山水》（三十年（1941 年）四月）、《明蓝瑛仿古山水》（二十九年（1940）四月）等书画、拓片 17 种<sup>5</sup>。

文献馆《文献丛编》（共 46 辑）在抗战期间出最后 5 辑，排印《苏州织造李煦奏折》（民国二十六年（1937）八月，文献馆将李煦奏折编目后，先在《文献丛编》上陆续发表，后汇印为专刊）〔图 23〕、《故宫清钱谱》（二十六年（1937 年）十月，考证清代制钱史，拓印宫中清代钱币精华）、《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会计司）》（二十六年（1937 年）五月），影印《批本处现行事宜》（二十六年（1937）八月）、《清内务府藏京城全图》（二十九年（1940）十二月），并出版了研究论文集《文献专刊——故宫博物院十九周年纪念》（三十三年（1944 年）十月）<sup>6</sup>。每年双十节为故宫博物院成立纪念日，二十四年（1935）前，多为《故宫》（月刊）、《故宫周刊》刊发书画，发行明信片纪念，二十四年后，多以“文献特刊”、“文献专刊”的方式刊发研究论著，其作者为院

1 《发行所呈送一九三七年九月份各款印品收入月报总表一份请鉴核备案由》，故宫博物院档案室藏：《故宫博物院·财务类》第 245 卷，第 2 页，民国二十七年（1938）二月十四日。

2 《本院各项工作报告》，故宫博物院档案室藏：《故宫博物院·计划总结报表类》第 105 卷，第 45 页，民国三十二年（1943）。

3 《本院解款清单出版物发售表一件送财务总署》，故宫博物院档案室藏：《故宫博物院·财务类》第 94 卷，第 32 页，民国二十九年（1940）十一月十一日。

4 《三十二年度十二月份出版物售价归还垫款已解缴中联银行照收填具凭单等情与库收相符合准备查由》，故宫博物院档案室藏：《故宫博物院·财务类》第 269 卷，第 1 页，民国三十三年（1944）五月十二日。

5 《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北平本院八年工作报告》（二十六年七月至三十四年九月），第 23 页，故宫博物院编印，民国三十四年（1945）。

6 《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北平本院八年工作报告》（二十六年七月至三十四年九月），第 27 页，故宫博物院编印，民国三十四年（1945）。



图 23 《苏州织造李煦奏摺》封面

外知名学者或者本院延请的专门委员，以及院内的年轻学者。

总务处校印《清宫述闻》（民国三十年（1941）出版，其编纂宗旨为“旧闻遗事，徵信为尚”，取材以清代官家史志、谕旨、奏疏等为主）、《宫殿摄影》一册、《故宫导游》一册（三十三年（1944）四月，介绍了宫殿处所沿革及掌故，伪院长祝书元题名）<sup>1</sup>，此外，还有《故宫游览案内》（日文版）<sup>2</sup>。

抗战期间，南迁书画文物还在贵州举办过展览，出版了《故宫书画展览目录》，又名《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在筑书画展览会展品目录》<sup>3</sup>。

## 2. 重印类

重印类主要为古物馆的出版物，抗战期间重印了部分《故宫》（月刊）、《故宫周刊》、《故宫书画集》等期刊，以及《宋拓定武兰亭叙》（民国三十二年（1943）五月第3版）、《故宫名画梅集》（三十一年（1942）十二月再版）、《宋拓中兴颂》（二十九年（1940）九月再版）等书画类专集，共28项，各个刊物重印版数分别为再版、三版、四版<sup>4</sup>。重印刊

物一般都要经过修订，古物馆“从前刊物再版时尚须加以修正，订其谬伪”，据三十年（1941）《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三十年工作报告》，古物馆“编校再版《宋苏轼前赤壁赋》说明及小传……编校再版《故宫书画集》第四十期说明小传……编校三版《故宫书画集》第二期说明及小传”<sup>5</sup>，在艰苦的环境中学风依然严谨。

## （三）出版特点

由于时局及经费问题，故宫抗战期间的出版事业，相对于已呈下降趋势的南迁时期，更呈断崖下跌之势。北平本院古物馆“抗战军兴，南北隔绝，此间材料既感缺乏，物资更苦拮据，故八年来仅由留平之残余书画中出版数种，其余均系重版刊物，为数亦远逊于前”；图书馆“自事变以后，因经费拮据，所编各种刊物，多不能印行”；文献馆“文献馆之编印工作，亦因经费关系，多不能按照预定计划进行，仅有少数出版”<sup>6</sup>。国难当头，出版事业异常惨淡。

此外，由于南迁之故，故宫印刷所停止运作，出版物均为外间印刷机构承印，如北平文雅社承印《清内务府藏京城全图》，北平天华印书局承印《文献专刊》（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二十周年纪念），书画类专刊基本都是彩华印书局承印，如《宋贤书翰》、《法书大观》等。

1 《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北平本院八年工作报告》（二十六年七月至三十四年九月），第27页，故宫博物院编印，民国三十四年（1945）。

2 故宫博物院编：《故宫游览案内》（日文），新民印书局，民国三十二年（1943）。

3 《故宫书画展览目录》，贵州艺术馆编印，民国三十三年（1944）四月。

4 《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北平本院八年工作报告》（二十六年七月至三十四年九月），第23页，故宫博物院编印，民国三十四年（1945）。

5 《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三十年工作报告》，第12页，故宫博物院编印，民国三十年（1941）。

6 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北平本院八年工作报告》（二十六年七月至三十四年九月），第20～26页，故宫博物院编印，民国三十四年（1945）。

## 六 民国故宫博物院出版的余音：南京国民政府后期

南京国民政府后期的时间跨度为 1945 年（民国三十四年）9 月至 1949 年 10 月，共 4 年时间。疏散到后方的文物复员到南京，而北平本院则忙于接收古物陈列所。这一阶段，故宫的文献整理、研究、出版仍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图书馆也有前期编好的书目印行，古物馆有书画资料、影印作品行世。此外，总结北平本院在敌伪占领期的工作，以及院外文物展览，都出版了相应著作。

### （一）与出版有关的院务

抗战胜利后，文物复员、接收古物陈列所以及部分精华文物运台，本院人员仍不能将主要精力放在文物事业及出版事业上。故宫印刷所未随抗战胜利而复归。本院抗战期间的中流砥柱总务处新制定了办事细则，其中包括多条与出版有关的条款。

#### 1. 文物复员

民国三十四年（1945）八月，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十月十日，华北战区受降仪式在太和殿前举行，当月，教育部派沈兼士会同张庭济接收北平本院。第二年，西迁文物东归，十二月三日，行政院决定故宫博物院改隶行政院，古物陈列所归并故宫博物院。三十七年（1948）九月一日，点收古物陈列所文物，十一月二十二日全部交接完成。年底，淮海战役到了紧要关头，存放在南京的故宫南迁文物的四分之一运到了台湾。三十八年（1949）一月，北乎和平解放，二月，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派代表接管了故宫博物院。

#### 2. 故宫印刷所善后

抗战前古物陈列所南迁后，残留北平原址物品分散放置在东连房各处，其后东连房做过宿舍，印刷所部分物品移存于景山观德殿东配殿内，而前交通大队将东配殿库房擅自开启，改为无线电情报室。1949 年，故宫委派科长朱家濂处理故宫印刷所存平物品账目，朱家濂与印刷所库房前后管理人员缪辉曾、宋麟徵一道，基本上理清印刷所的残旧物品，结合印刷所南迁前的《本院印刷所存平物品编号簿》，整理上交了《本院印刷所存平残旧物品移交清册》<sup>1</sup>。

#### 3. 总务处与出版有关的制度

民国三十七年（1948），总务处制定《本院总务处办事细则》，总务处下分第一至第五科，科下设股。出版事务由第五科第三股职掌：“（一）关于印刷出版事项，（二）关于摄影传拓事项，（三）关于招商承应出版物之比价或投标事项，（四）关于出版物之核定价格事项，（五）关于出版物及底板之统计保管事项，（六）关于出版物之发行及物品发售事项。”发行所改为发售室后，其职员由总务处员工兼任，第五科办事细则规定，“本科所属出版物发售室除出纳由第三科调派外，其主任由第三股主任兼任，业务人员由该股职员兼任”<sup>2</sup>。“关于本院出版物之盖用版权印事项”规定由第一科第二股职掌<sup>3</sup>。此外，招商印刷、定价等都有明确的规定。

1 朱家濂：《故宫印刷所原存平残旧物品》，故宫博物院档案室藏：《故宫博物院·行政事务类》第 94 卷，第 22～23 页，民国三十八年（1949）五月二十三日。

2 《本院总务处第五科办事细则》，故宫博物院档案室藏：《故宫博物院·领导指导类》第 162 卷，第 13 页，民国三十七年（1948）。

3 《本院总务处第一科办事细则》，故宫博物院档案室藏：《故宫博物院·领导指导类》第 162 卷，第 1 页，民国三十七年（1948）。

## (二) 出版物

这一时期的刊物有院务刊物、补出因抗战延误出版的刊物、前期出版物的后续出版等。

### 1. 院务刊物

抗战胜利后，故宫北平本院脱离了日伪当局八年的控制，故宫首脑机关从抗战后方回归。《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北平本院八年工作报告》<sup>1</sup>、《故宫博物院对于平市历次收集铜铁应付情形始末记》<sup>2</sup>等著作，反应了北平本院在日据时代的惨淡经营的状况。

### 2. 补出因抗战延误出版的刊物

《清内阁旧藏汉文黄册联合目录》在民国二十六年（1937）校印将次竣事，因故暂停<sup>3</sup>，三十六年（1947）年终于印了出来。<sup>4</sup>蔡元培先生在序言中所说的“任事者之勤苦，即阅览者之便利”点出了该书的价值。是书由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就各自所藏的清代汉文黄册联合编印成书。

### 3. 前期出版物的后续出版



图 24 《清季教案史料》（二）封面

民国二十年（1931）八月图书馆编印《故宫方志目》，古物南迁后，图书馆将存平方志编为《故宫方志目续编》于三十七年（1948）一月出版。该书在抗战期间就已经编好，三十四年（1945）六月八日，因图书馆自修书处提集的宋元明版书籍因受潮霉毁损，图书馆向总务处发函，请求雇工装修，并顺带请求印刷《故宫方志目续编》<sup>5</sup>。

民国二十六年（1937）六月文献馆出版《清季教案史料》（一），《清季教案史料》（二）〔图 24〕于三十七年（1948）三月出版<sup>6</sup>。

### 4. 其他出版物

古物馆印行了《邓文原草草真迹》<sup>7</sup>、《米芾尺牘》<sup>8</sup>等书画作品。

图书馆排印书画论著《詹东图玄览编四卷附录一卷》<sup>9</sup>，影印版本装璜价值极大的《唐写本王仁煦刊谬补缺切韵》<sup>10</sup>。前者“以古物馆藏写本录副，付诸铅槧，复假中央研究院北平办事处所藏明写本校勘讹谬”，编纂颇费心力。后者本为清宫藏品，逊清小朝廷时流散到民间，“本院以重金购存，

1 《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北平本院八年工作报告》（二十六年七月至三十四年九月），第 27 页，故宫博物院编印，民国三十四年（1945）。

2 《故宫博物院对于平市历次收集铜铁应付情形始末记》，故宫博物院编印，约民国三十四年（1945）。

3 《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工作报告》（民国二十六年七月至十二月），第 18 页，故宫博物院编印，民国二十六年（1937）。

4 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清内阁旧藏汉文黄册联合目录》，北京大学印刷所、瀚华永配印书局，民国三十六年（1947）十月。

5 《关于图书馆自修书处提集之宋元明版书籍因受潮霉多毁损应雇工装修以便度藏》，故宫博物院档案室藏：《故宫博物院·档案图书文书类》第 81 卷，第 2 页，民国三十四年（1945）六月八日。

6 《清季教案史料》（二），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印，民国三十七年（1948）三月。

7 故宫博物院编：《邓文原草草真迹》，彩华印刷局，民国三十六年（1947）。

8 故宫博物院编：《米芾尺牘》，彩华印刷局，民国三十六年（1947）十二月。

9 《詹东图玄览编四卷附录一卷》，故宫博物院编印，民国三十六年（1947）十二月。

10 故宫博物院编：《唐写本王仁煦刊谬补缺切韵》，彩华印刷局，民国三十六年（1947）。

用珂罗版景印发售预约，以广流传”<sup>1</sup>。

文献馆出版论文集《文献专刊——国立故宫博物院成立二十周年纪念刊》<sup>2</sup>、《文献论丛——沈兼士先生纪念刊》<sup>3</sup>。在民国期间，文献馆的研究论著出版最为丰硕。

应四川省要求，故宫精选西迁文物中的百件书画精品，于民国三十五年（1946）十一月在成都举办告别展览，并出版了《故宫书画在蓉展览目录》<sup>4</sup>。

### （三）出版特点

抗战胜利，故宫博物院同人心情振奋，拟订了多项出版计划，但实现者寥寥无几。以民国三十六年（1947）的出版计划为例。总务处计划，“至继续编纂事项，如《清宫述闻续编》，应加修校刊行，后即应搜集材料，编纂三编，又如《故宫沿革史稿》，尚须搜集材料，增补缺漏，并悉心修正”<sup>5</sup>。但《清宫述闻续编》在民国年间并未印行，而《故宫沿革史稿》也未完稿。图书馆计划，三十六年“馆编《故宫善本书目续编》一册、《故宫普通书目续编》一册、《故宫方志目续编》一册，拟校印”<sup>6</sup>，但最终只有《故宫方志目续编》出版。文献馆计划三十六年继续出版刊物3种、拟新出版刊物7种、再版刊物3种，规模不可谓不大。其中，继续出版刊物有“《文献丛编》，已出至四十六期，先拟复刊，每月出一期”<sup>7</sup>，但几个月后，文献馆召开编辑事项谈话会，关于《文献丛编》，“决议：不再继续。重要史料，择尤编印单行本，在双十节前至少出版两种”<sup>8</sup>，《文献丛编》为文献馆的招牌刊物，放弃复刊，反映了当时故宫的经费不能支撑需持续耗费的期刊。

## 七 结语：故宫博物院出版在民国出版史和文化史上的地位

故宫拥有中国农耕社会所遗留的文物、文献、建筑群以及与明清历史息息相关的历史场景，而参与故宫博物院创建的中坚力量是来自当时全国的学术思想中心北京大学的知名教授，吴瀛后来曾回忆：“（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长李石曾在北大任教，所以以北大为中坚，在最初的时期，高级一些的，都是北大的高级教职员，有如我这本记载里的主要分子，如李宗侗（玄伯）、沈兼士、马衡（叔平）、袁同礼（守和）、俞同奎（星枢）五位，都是后来故宫博物院掌握实权的人物，都是北大当时的重要教职员。”<sup>9</sup>因此，故宫博物院创建的起点非常高，其文物（文献）的整理、展陈、出版、研究工作等都迅速达到一个相当的高度，其中的出版事

1 《三十六年度工作报告》（图书馆），故宫博物院档案室藏：《故宫博物院·计划总结报表类》第138卷，第8页，民国三十六年（1947）。

2 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文献专刊——国立故宫博物院成立二十周年纪念刊》，北平天华印书局，民国三十四年（1945）十月。

3 《文献论丛——沈兼士先生纪念刊》，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印，民国三十七年（1948）。

4 《故宫书画在蓉展览目录》，故宫博物院编印，民国三十五年（1946）。

5 《总务处第二科三十六年度工作计划》，故宫博物院档案室藏：《故宫博物院·计划总结报表类》第139卷，第1～5页，民国三十六年（1947）。

6 《三十六年度图书馆进行议案》，故宫博物院档案室藏：《故宫博物院·计划总结报表类》第138卷，第4页，民国三十六年（1947）。

7 《文献馆三十六年工作计划》，故宫博物院档案室藏：《故宫博物院·计划总结报表类》第142卷，第5～6页，民国三十六年（1947）。

8 《本院文献馆关于编辑事项谈话会纪录》，《故宫博物院·领导指导类》第144卷，第14页，民国三十六年（1947）五月三十日。

9 吴瀛：《故宫尘梦录》，第63页，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

业,从严格意义上讲,并不是全院工作的重心,在本院的历年工作报告中,出版处于最末的位置<sup>1</sup>,但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在民国出版史和文化史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 (一) 故宫博物院出版在民国出版史上的地位

故宫出版在民国出版史上的占据重要地位,主要体现在:

#### 第一, 故宫博物院出版在民国博物馆界独占鳌头

据不完全统计,民国年间,故宫博物院出版的刊物有近300种,形成了自己的出版特色<sup>2</sup>,其他博物馆难以望其项背,略举两例:同在紫禁城的古物陈列所(民国三年(1914)至民国三十七年(1948))出版刊物近100种,与故宫博物院同期成立的河北第一博物院,出版刊物约10种,与故宫博物院的差距都非常大。

#### 第二, 故宫博物院出版具有民国大出版社气象

民国年间,中国先后出现了七大出版机构,含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店、中正书局、贵阳文同书局等。其中,商务印书馆是我国最早按现代企业制度建立起来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设有编译所、印刷所、发行所,可以独立完成编辑、印刷、发行业务,而故宫博物院的出版建制,由文献馆、图书馆、文献馆等负责编纂,由故宫印刷所负责印刷(民国二十年(1931)至二十五年(1936)),由出版物发售室(发行所)负责发行工作,这一点,是一般的中小型出版机构所不具备的。

此外,在民国时期出版业的出版类别分布中,由于资源的优势,故宫出版的古器物、古书画、清代史料等图书最有价值、分量最重。

但长期以来,学术界似未注意到民国故宫出版的地位。吴永贵先生《民国出版史》在统计北平抗战前的出版机构时,引述邱崇丙、子钊先生《民国时期的北京的出版机构》一文,认为北平出版物总数超过100家以上的出版机构有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文化学社、地质调查所、北平研究院五家<sup>3</sup>。而故宫约300种出版物中,绝大部分出版于战前,因此,该统计漏掉了故宫博物院。

### (二) 故宫博物院出版在民国文化艺术史上的地位

民国故宫的出版事业,尤其是古物南迁前黄金时期的出版事业,对于中国文化艺术史,也具有特殊的意义。

#### 第一, 通过出版弘扬传统文化艺术,是民国故宫博物院先贤的共识

故宫博物院成立且对公众开放后,再通过出版弘扬传统文化艺术,是民国故宫先贤的基本共识,1929年李宗侗先生在《故宫》(月刊)序言中谓:“今者点查既已粗具,渐辟各陈列室,开展览。又虑路远者之弗能目睹也。乃公决以珂罗版影印藏品,古物图书建筑文献靡所不括,月出一册,以饷国人。又附丽以帝后像

1 如《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北平本院八年工作报告》(二十六年七月至三十四年九月)各项业务工作排列顺序为:甲、文物之点收;乙、文物之保管;丙、修建工程;丁、参观;戊、文物之整理及审查;己、文物之陈列展览;庚、文物之编印流传。《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北平本院八年工作报告》(二十六年七月至三十四年九月),故宫博物院编印,民国三十四年(1945)。

2 关于民国时期故宫博物院出版的特点,朱赛虹女士已有深入研究,归纳为资源共享的出版宗旨、编辑工作的全员性、出版物的资料性、资料发布的系统性、学科门类的全面性、出版发行的及时性、出版品种的丰富性、刊发资料的珍贵性、印制装帧的多样性、出版流传的长久性、出版管理的自发性等特点。参见朱赛虹:《故宫博物院出版事业的首度辉煌——民国时期出版综论》,《故宫博物院院刊》2011年第1期。

3 吴永贵:《民国出版史》,第97页,海峡出版发行集团,2011年。

名画等各专集。然后故宫藏品庶几家知户晓,其于文化史俾益,岂浅鲜哉?”<sup>1</sup> 易培基先生在《故宫周刊·弁言》谓:“(故宫对公众开放后)同人犹虑传播之不广,遂有拓印古器景印书籍字画之举,最近复编有《故宫》月刊,皆所以为振导吾国固有之文化之助者也。”<sup>2</sup> 因此,故宫博物院在已辟展开放的情况下,考虑到“又虑路远者之弗能目睹也”,因此,编印系列刊物,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手段,将封闭的皇家收藏转化为天下人共享的公共文化财富。

## 第二,通过宣扬传统文化艺术,促进当下文化艺术的进步

故宫宣扬传统文化艺术的目的是促进国家当下文化艺术的进步,易培基先生对此有精辟的论述:“自来文章艺术,欲求其精诣,必先深研古人之作,始可敢发新知,博雅而后淹通,宏中乃能肆外,舍此无他道也。是以国家欲增进其新进之文明,非发扬其固有之文明不可。”<sup>3</sup> 中国文化艺术的进步,依赖于时人的新创造,而时人要创新,必须要具备深厚的文化艺术底蕴,而故宫通过展陈与出版公布皇家收藏资源,无疑为文化艺术界公开了中国最好的历代艺术收藏。

有学者在研究紫禁城外朝的古物陈列所所藏绘画作品对民国绘画的影响时指出,“博物馆向公众开放原先‘秘不示人’、‘深藏内府’的古代绘画作品,是促使民国初期中国画背离晚清‘正统派’的重要原因之一”。<sup>4</sup> 虽然该文未将故宫博物院作为研究对象,但故宫博物院展陈、刊布的内府收藏古代绘画作品,远超出物陈列所。因此,故宫博物院展陈与出版,对当时文化艺术进步的影响,显然是非常深远的。

故宫博物院民国编著的出版物在当时和后世都发挥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其中的《故宫》(月刊)《故宫周刊》、《文献丛编》等刊物一印再印,直到今天,还是相关学术研究的必备资料。数十年时光飞逝,斯人已逝,故物长存,我们相信,故宫先贤将故宫所藏的国宝化私为公,变皇家秘藏为世人所共享的文化资源的使命感与精神,将与这些出版物一起永存。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图书馆]

1 吴永贵:《民国出版史》,第97页,海峡出版发行集团,2011年。

2 李宗侗:《故宫·序》,《故宫》(月刊)(第一期),故宫博物院编印,民国十八年(1929)九月。

3 易培基:《故宫周刊·弁言》,《故宫周刊》(第一期),故宫博物院编印,民国十八年(1929)十月。

4 杭春晓:《绘画资源:由“秘藏”走向“开放”——古物陈列所的成立与民国初期中国画》,《文艺研究》2005年第12期。





